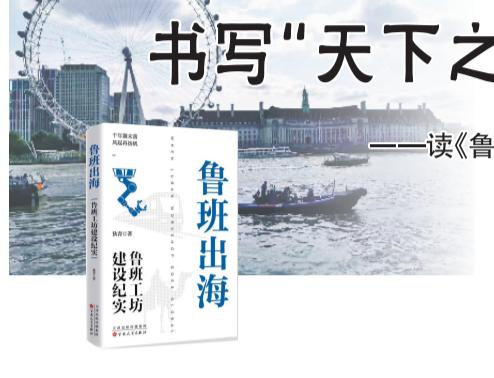


近日,天津作家狄青的长篇报告文学《鲁班出海——鲁班工坊建设纪实》(以下简称《鲁班出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作品聚焦“国之大者”,以强烈的现实关怀、精深的专业表达、生动的长篇叙事,为鲁班工坊这一天津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修史立传,可谓当前文学界书写“天下之津”的又一精品力作,将新时代津派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津派文艺是津派文化的核心部分和生动体现,其中津派文学历史悠久、津味十足,形成了赓续不绝的三大传统:一是深入生活、紧贴时代的人文精神。二是写作勤奋、态度严谨的专业精神。三是真诚为本、自成风格的独创精神。《鲁班出海》同样体现了这三大传统,且首次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从天津走向世界的鲁班工坊。对于这一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新事物,很多人或许还略感陌生,但它其实是“天下之津”气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此,作家狄青以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使命感,对以往的创作进行了大胆突破,重点书写了“国家名片”上的“天津底色”“鲁班工坊里的天津人”等,让正在阔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天下之津”,在文学中有了可信、可爱、可敬的生动展示。

鲁班工坊作为天津原创并率先推动、组织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知名品牌项目,是以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以“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果为总体支撑,在境外创建的实施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合作机构。在短短十年间,有30个国家设立了鲁班工坊,开设了70多个专业,累计招收学生6000余人、非学生30000余人次,培训外方专业教师4000余人次,中外院校合作开发教材200余种。其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专业之深、项目之众,若非有大气、正气、才气和气的文学行家里手,很难去驾驭这一重要重大且复杂艰巨的现实题材,不大可能写



书写“天下之津”的精品力作

——读《鲁班出海——鲁班工坊建设纪实》

罗海燕

出其中的脉络、魂魄、理论、实践及厚度和深情。但是,狄青做到了。

这种成功得益于狄青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艺术修为,也跟他长年的记者经历有着直接关系。狄青“出道”很早,17岁即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作品,作家赵敬早年称其是“天津东郊文学平原上的一颗新星”,评论家黄桂元曾称其熟稔中外地理,“应该更适合当地地理学家而不是文学家”。除了作家、编辑,狄青的一个重要身份是记者,在担任天津工人报社、支部生活杂志社记者时,他几乎跑遍天津所有城乡,发表的相关报道不计其数。众所周知,成功的报告文学需要兼具三性,即真实性、新闻性和文学性,缺一不可。为完成《鲁班出海》这一重大写作任务,他发挥记者专长,在四五五年的时间里,广泛收集整理素材,采访了大量从国外回津的鲁班工坊建设者,以及众多鲁班工坊的受益者。他也曾自道,这次的写作耗时耗力,更“是一次溯源求源的精神跋涉,让我穿越古今,与历史深处的东方智慧和坚韧灵魂‘对话’”。

《鲁班出海》全书分为五部分,由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篇,然后以距离北京几千公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建设正式切入正题,中间则从古代与当代等不同维度展开叙述,同时将代表性人物传记融入整体框架,最后以推动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作为结束。据不完全统计,《鲁班出海》一书讲述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故事或片段,但是整体读来却不仅不混乱,反而有顺有逆、有正有反,有“工笔”有“写意”,井然有序、张弛有度,展现了作者超强的叙事能力。可以说,这部纪实之作,不仅是严肃的史志,还是精彩的传记,更是感人的诗篇。

好的报告文学必然具有强烈的历史纵横感和包罗丰富的书写内容。《鲁班出海》的内容决定着它既是史,也是志,必须纵向梳理鲁班工坊的缘起、发展、转型和成效,同时横向讲述鲁班工坊的理念、组织、构成、运行、政策和举措等。一般而言,这样的作品读起来相对枯燥,但《鲁班出海》却既大开大合又精雕细琢,打破了史志线性铺陈和烦琐罗列的惯常笔法,借助典型故事,通过当事人之口予以呈现。例如,对于鲁班工坊的命名、标识以及“五位一体”的教育理念等,就是通过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教师哈希姆·比萨拉和柬埔寨教师歌塞芒达的经历自然道出,大有润物细无声之效。再如,书中以较大幅面追溯了鲁班、墨子学说以及黄炎培、陶行知的思想,在通古今之变中,巧妙地展示了古代教人在教育模式、教育话语、教育体系等方面最新的发展。

优秀的报告文学也离不开典型的人物塑造以及中肯的评判论定。《鲁班出海》有很强的传记性,其中关于外国人的传记,自然融入了不同的案例,而对于中国人的传记则采取了集中处理的方式。例如,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吕景泉,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深度参与、亲身见证鲁班工坊发展的人物,书中并未简单罗列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侧重书写他从教的心路历程和具体感受,最终通过一个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一个行业,同时也道出了鲁班工坊在国际上广受欢迎的深层原因。而千里姻缘“鲁班”牵的黄可莹和孙健鹏的跨国爱情故事,生动体现了鲁班工坊在推动国际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的极大作用。

理想的报告文学,同样需要学术的眼光。如果作者不能深刻了解所写对象,很容易造成“浅”和“隔”,既不能让“业内人士”信服,也很难打动普通读者。在阅读《鲁班出海》时,我们却能时时感到作者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现状、发展的熟稔,以及专业的理性和冷静。书中讲道理、摆事实、列数据,归纳总结了鲁班工坊十年来取得的耀眼成绩,同时也提出了为其更好发展的咨政建言。书中关于进一步广泛构建合作平台、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优化教学资源、聚焦师资建设等提议,都堪为切中肯綮的对策建议。

说到底,报告文学的本质是文学,能不能感染读者是不可或缺的评判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鲁班出海》不仅是一幅人物群像图,还是一幅天津民俗画卷,更是一首感动人的长诗。书中穿插了天津建城6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介绍了近代开埠以后繁荣的商业和先进的教育,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鲁班工坊之所以诞生在天津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同时,又经来津外国人的异域之眼,用心绘制出包括五大道、古文化街、鼓楼、“天津之眼”以及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麻花、天津煎饼馃子、泥人张等建筑、美食和工艺等在内的津沽“清明上河图”。

书中不仅以诗意笔墨摹写了北京迷人的秋天和各国鲁班工坊所在城市的优美风景,而且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听闻非洲要再建设10个鲁班工坊后专家的激动,还有只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埃及鲁班工坊实训室设备安装调试的紧张,远隔重洋、两地分居教师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外国学生对中国教师的感恩,等等。书中以看似平常的一个个小故事,讲述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援外教师江锋、高洋夫妇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辛苦、人生地不熟的挑战、柴米油盐的琐屑、对国内孩子的挂念,以及在此期间的苦恼、失落和触动、美好等,都通过大量真实细节,展示在读者面前。相信每个人读后都会心生感动,更能理解和钦佩鲁班工坊成功背后无数援外人员的付出和伟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可以说,《鲁班出海》做到了同时代相互呼应,与现实同频共振,它的成功也为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书写重大事件和重大成就提供了新的示范和引领。

矗立在解放桥桥头的百福大楼,始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是天津早期专供出租的商业综合写字楼,其船形设计被视为天津象征性建筑的代表作之一,象征着天津法租界进入“摩登”时代,具有重要的建筑艺术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2013年1月,百福大楼旧址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当年在百福大楼以东的地方亦是法式建筑。但让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地方在二百多年前居然有一座与海河相通、专以停泊龙舟而供皇帝来津巡游之用的皇船坞。

坞,指的是周围高而中央凹的地方。船坞是指修造船或贮停船用的坞式建筑,灌水后可容船进出。天津的这座皇船坞与其说是船坞,是贮存“御舟”的处所,倒不如说是一片辉煌而有气势的皇家建筑群。在清代的“天津八景”中有“广厦舟屯”一景,指的就是这里。皇船坞位于现今市内的中心地带,早已被填平、拆毁,今已鲜为人知。但它在清代确是一处大名鼎鼎的胜迹,并在天津历史上着实红火了一阵子。

皇船坞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其坐落地点据《天津县志》里说:“在天津闸口水围,御用龙舟俱贮此。”

《天津县志》说:“皇船坞康熙五十二年建,乾隆二十六年改建,坞房贮御舟十一艘,立内外坝以备出入,设石闸以司启闭,所贮有安福舻、翔凤艇、行春舫、第一舟、沙飞船、湖船、乌图里船等,舟之最大者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

广厦舟屯盛典隆

章用秀

长九丈三尺,阔一丈九尺。有坞房五十四间,周长一百六十丈,“林木青苍,颇绕幽胜”。乾隆时代的诗人汪沆有诗云:“船坞周遭百丈强……”诗中所说的“周遭百丈”并不夸张。按今日估算,皇船坞的面积当在30亩以上。同时代的天津知县张奇志有咏皇船坞诗云:“亭亭依岸舣龙舸,碧瓦参差照绿波。玉辇不来春树长,游鳞争比旧时多。”诗中勾勒出这里非同一般的气派与景象:数条御船停泊在“亭式”坞房内,座座“碧瓦”的船坞顶映耀在波光之中,鱼儿在水中游弋,河柳丝丝,绿意融融。著名文人蒋诗也有咏皇船坞诗云:“皇船坞口是渔家,杨柳青青拂岸斜。绝似西湖好风景,二分烟水一分花。”皇船坞周围遍植杨柳,坞口渔家归舟,其景真如钱塘湖水。

清代,天津的海河、南北运河的航道承担着漕粮运输、百姓往来于南北、士子赴京赶考等水路交通的重任,也是皇帝南巡、赴大沽口巡海的水路航线。走水路要有停船的船坞。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的皇船坞也是海河航运的产物。特别要提的是清代帝王中来天津次数最多的两位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对船坞的需求。由于康熙、乾隆及清代其他皇帝与天津的

前一段时间,品评宁宗一先生学术人生的文章多起来了,多为各届学生的思往之作。这让我思及与宁先生相关的一些往事。

我与宁先生的交往,得从恩师李厚基先生说起。1979年,我有幸忝作李厚基、陈玉璞两位老师研究生的时候,就常在厚基先生家中见到宁先生的身影。宁先生说,这里是他的“避难所”,凡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就到这里来“避风”。后来,在厚基先生生病的时候,宁先生也常常前来帮忙照料,可见,他俩是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之间的情谊首先是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已是国内知名学者。不过,宁先生一直很谦虚,他曾对厚基先生说:“我们且做小名人。”当时他俩还都是副教授。

和宁先生接触较多是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这是天津社联语文学会下属的一个学术组织,除了几位顾问,常务理事还有鲁德才、陈玉璞、滕云等几位先生。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应由南开大学的老师出任会长,而这个学会却推厚基先生做会长,宁先生甘作副会长。他半开玩笑地解释说:“因为他的水平高!”不久厚基先生生病,会务实际上主要由宁先生操持。这个研究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成员除了戏研室和社科院的同行,主要为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两校的研究生。我参加的那次,会上要求我们每人都要准备文章进行交流,同时,要编辑出版一本论文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谈艺录》,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这本论文集上。

在治学方面,宁先生对我辈的要求是很严格的。1984年5月,南开大学组织召开“全国古小说讨论会”,我本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听会的。主持会议的宁先生突然点名要我发言,猝不及防之下,只好词不达意地敷衍几句,好不狼狈。此后,凡参加学术会,我一定会做好发言的准备。而在成长之路上,宁先生对我等又总是呵护有加。他不仅主持了我与同门的研究生答辩,十几年后,当我们带的研究生答辩时,宁先生也常常被邀请屈尊前来主持。他每每有求必应,而且仍旧是那么一丝不苟,认真应对。每当我们中有人因职称晋升或申请项目需要导师推荐时,就自然想起宁先生。凡是了解的人,他都会倾力相助。最让我难忘的是2003年我准备出版一本论文集,想请德高望

我心目中的宁宗一老师

林骅



李清照、辛弃疾的几首名篇,衣装笔挺,风度翩翩,声情并茂,温文尔雅,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后,也有几次去听先生的课。虽然是讲授式,而且一般不离讲稿,但他讲的都是生动的书面语言,高屋建瓴,声如洪钟,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对俄国的一些作家及西方的文论信手拈来。这样的讲稿几乎不用加工,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听来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上世纪90年代,宁先生退休了,但他似乎比在岗时更忙。他受邀到天津大学等名校兼课,继续在三尺讲台上大放异彩;身兼几个全国学会的会长,经常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而且总会有重点发言,见新迭出;学术上更是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教书人手记》《名著重读》《心灵文本》等一部部著述联翩面世。先生以教学为重心,糅进自己的人生感悟,又以金学和心学为两个突破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但先生从不以大家自居。他常常谦称自己是“硕士生导师”,因为他退休时,学校还没有博士点。他也常自称“本科学历”,在书房的显著位置上还摆放着他的本科毕业证书。

宁先生的生活极其低调,一直住在校内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里,两室一厅。儿子在外地,自己一个人过着平静而恬然的生活。每天除了坐拥书城不停地读写之外,便是接待来访客人。年过九旬的他有着独特的养生之道:“不体检、不过节(包括生日)、不刻意养生”,自己戏称“三不主义”。最喜食粥,高寿或得益于常年熬的八宝粥。住所旁边的天泽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见到好书,禁不住还要购买。网上阅读也是他的一大爱好,每天都要分享一组最新的学术信息,思维仍活跃在学术前沿。可谓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已至。

题图摄影:王爽

绚丽火花迎国庆

郭建国



在新中国的火花史上,新中国的生日常与喜庆的灯笼、巍巍的天安门和庆祝标语等图案、文字相伴,很多个不同寻常的生日,火花都给予了恰当的表现。全国有近30家火柴厂出品过“国庆”纪念火花。这些火花的图案洋溢着祥和、欢快的气氛,且不说以“欢庆”等为主题的画面,即便是以“民族舞蹈”“建设成就”等内容为主题的火花,其设计者也同样把浓浓的爱国情,透过盈寸盒面,传递给世人。

1959年,我国的“套花”刚问世不久,吉林、广东等近10家火柴厂就推出了“国庆10周年”纪念“套花”火花。其中,武汉火柴厂出品的“国庆10周年”火花,全套2枚,分别以天安门放飞的彩色气球和武汉长江大桥飘扬的红旗为图(图1);苏州鸿生火柴厂出品的“国庆10周年”火花共11枚,除两枚分别为“天安门、红旗”(图2)“舞龙、灯笼”图案外,其余9枚在宣传新中国10年建设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难得的岁月痕迹,增加了历史性和文物价值。

此后在国庆15周年、30周年、35周年、40周年、50周年时,很多火柴厂都有纪念火花面市。

1964年,徐州火柴厂为新中国15岁生日出品了一套2枚的纪念火花。

其中一枚主图为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著名的“和平鸽”,衔着印有“15”字样的红灯笼,图案设计简洁流畅。

1979年,天津火柴厂专为国庆30周年设计了一套5枚的“礼花”卡标火花(图3),盒面为缤纷的礼花,盒底则分别反映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我国在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欣赏这套火花,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让人欢欣鼓舞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火柴工业处于鼎盛时期,1984年,各地火柴厂纷纷为国庆35周年推出火花,这也是国庆火花品种最为丰富的一年。营口火柴厂的火花以红日和白鹤构图,寓意祖国欣欣向荣;建平火柴厂的火花以长城、人民大会堂等为主题,并印有一句鼓舞人心的标语,似一幅“袖珍”国庆宣传画;资中火柴厂的火花采用拼幅联张形式,天安门与华表四周环绕着10只仙鹤,整个火花洋溢着明快、喜庆的气氛。

1999年新中国迎来50华诞。全国32家火柴厂共同参与制作了一套54枚的“共和国足迹”火花。该火花以新中国发展的时间顺序,反映了共和国50年来的精彩瞬间,创下了国庆火花枚数最多的纪录。

一枚枚不同时期出品的国庆火花,将我们带入一个个欢庆的节日。时光如梭,新中国即将迎来第76个生日,这些颇有纪念意义的火花代表着人们的心声: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丽富强、繁荣昌盛!



这种机缘,更由于当时帝王出行大都依赖于水路,在海河边建皇船坞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换句话说,也正是海河航运造就了天津这座专供皇帝巡游之用的皇船坞。

关于皇船坞的确切地点,以往也有不同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有人说是在今天百货大楼斜对面靠近海河的地方,并说1955年夏和平路旁的胜利公园四周栽种矮松刨地换土时,在北面靠近人民银行芦庄子办事处的地方,距地面70厘米处挖掘出成行的大砖,经考证定正是当年皇船坞所用。其实这是不对的。《津门保甲图说》“东南一带村图说”讲得很明确:“火神庙稍东曰季家楼,其对岸曰皇船坞,为恭贮水围御用舟楫之所,昉自康熙时,跨流架屋,林木青苍,旁有炮台,亦旧时所筑,其上生树一株,土人云已近百年矣,附近居民即呼为炮台村。”季家楼即在今天的天津站一带,从“保甲图”上看,那皇船坞恰与季家楼隔河相望,处于海河弓形大弯的半包围之中,与早期著名寺院紫竹林相距不远。

《津门保甲图说》为官刻,镌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说明道光年间,皇船坞依然存在,后来逐渐湮没。清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这里成为法租界的一部分,其后这里用海河泥填垫抬高地面,相继建起洋楼,皇船坞不复存在。但百福大楼则保存了下来。2008年,在百福大楼以东建“津湾广场”,作为天津市20项大服务业聚集的地方之一,“广场”由多座欧式风格的地上商业建筑及地下商业街、停车场共同构成,并设有开放式广场及沿海河湾亲水平台,汇集了剧场、影院、书店、高端餐饮、娱乐等业态,成为人们观光、游玩、娱乐的好去处。

博物馆里的另类展品

陶灵



的注意:因奉旨建造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占用石成侯土地四分二厘,平定州对其被占用土地及青苗损失进行赔偿。这份官契上,格式化的内容以正楷字石印,从右至左分栏竖排,具体人物、地址、时间、金额及画押等不确定项,则由毛笔小楷字填写。整份契约分两部分,左边是一些文字和印章,右边为一幅黑白写实画:一座巍峨大山占据大半幅画面,山间几处窑洞点缀,山脚下有两个人物模样的人影,注视着一列行驶中庞大物般的火车……古老土地的宁静,正被现代文明的轰鸣声打破,呆板的契约顿时活泼起来。在一份道光二十九年(1849)外乡人的租房契约上,高大、气派的徽式民居前有两个人影,短衫人身面对长衫戴瓜帽者在述说着什么。

“契约中国”的大多数藏品为民间契约,有的填写在印制的“官契纸”中(便于官方收税),有的在普通宣纸和毛边纸上书写,内容多为土地与房屋买卖事宜,无一例外地画有图画:或农家小院、毛驴老井,或田地树木、山石人物……彩墨、黑白都有,字与画浑然一体,相映成趣,古人原来如此文艺、浪漫。

观考上,发现一份契约上的文字与图画间似有某种孤立感,仔细看,发现了端倪,或者说是“破绽”:字与图是拼接而成的。我恍然大悟,所有契约上的图画都是后期补作,包括那份官契上行驶的火车。怪就怪博物馆展厅的灯光太暗,又